

物。同时,全球化进程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化明显发展。美国在穆斯林聚集区武力反恐特别是借反恐之名发动对伊战争、谋求建立所谓“美国世纪”,又激起全球穆斯林更强烈的反美情绪。法、德、俄在安理会联手反对授权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就是顾及到其国内穆斯林的情感。英国和西班牙大力支持美发动对伊战争,结果惨遭恐怖袭击。随着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选举中败北、日本自卫队撤出伊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国内支持率下降以及大多数英国人主张与传统盟友美国保持距离,美志愿者联盟已坍塌大半。美对伊战争陷入困境,导致全球油气投机与价格飙升,引发新一轮地缘与能源角逐,搅得世界乌烟瘴气。美依据先发制人和政权改造战略发动对伊战争,加剧了一些中等国家的不安全感,导致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大幅度升级。凡此种种,说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扩展与深化,正无声但却无情地宣告强权政治时代末日的来临。继续推行炮舰政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结果都只能是“制造麻烦”。

第三,美国单极倾向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之间的矛盾有所变化。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实力政治,其核心是大国关系。主要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和态势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矛盾蜕变为美与多强的矛盾,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五年来,美国反恐与打伊受挫,硬实力作用下降,软实力明显受损;欧盟一体化进程颠簸;俄借助油气价格上涨,在重振国力方面成效显

著;日本借结构调整摆脱长期经济低迷;中国崛起势头强劲引起世界关注;印度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大国力量对比形成猛虎对群狼态势,大国关系表现得异常复杂。欧美实力地位不同,双方的战略观与安全观浮现根本性差异,欧盟大国对美武力反恐颇有微词;美借助对阿富汗战争进驻中亚,并策动中亚与高加索地区的“颜色革命”,对俄传统势力范围形成挤压;中国崛起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大国使东亚形成两强并立态势,两国政治战略关系陷入低谷。另一方面,美“9·11”后借助大国反恐,近年对外战略适度回归于多边协调,大国关系基本框架稳定,大国合作共同应对重大安全挑战的意愿与能力也在增强。近年来,美高度关注中国的加速崛起,强化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提升对印关系、巩固美日同盟等对华战略防范力度明显加大,也更加重视推进中美关系、期待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美关系进入深度相互依赖、高端利益竞争和高度战略敏感的新时期。总体上看,一超多强的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大国关系相对稳定与均衡发展的态势有望继续。中国继续稳步发展,难免引发周边大国对华战略戒备与防范升级,但也同样给这些国家带来机遇,大国对华合作与借重的一面还会发展。即使中国继续崛起并逐步具备超级大国的某些特质,中美关系也未必会重蹈美苏对抗的覆辙。只要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努力推动建立和谐世界,继续维护好、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国对华合作和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从中国方面来说就是有保障的。○

## 欧亚地缘政治新变局

李义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五年前,“9·11事件”以“不对称战争”的罕见形式对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予以心理、精神和有形物质的重创。不仅如此,这一事件还给国际形势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地缘政治所受到的影响是一个重要视角。“9·11事件”引发了一系列

地缘政治上的连锁效应,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地缘政治已出现一种“不对称的结构”,其主体更趋多元化。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人们似乎认为地缘政治是大国间的角逐场,但现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主体之

一,它也可以凭借手中握有的军事力量、技术和资源对大国、包括超级大国发动不经宣布的战争,进而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地缘政治。应该说,大国及超级大国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的结构”,地缘政治变成了不对称对手之间的一个角逐场。在这种不对称局面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处境非常尴尬,“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和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而且是其今后将要不断面临的地缘政治难题,即它的本土已经变成受到直接攻击的对象。曾几何时,不少美国人确信,美国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世界两大洋3000—6000英里的宽阔水域将之与其他强国隔开,不仅使其极少遭到外敌入侵,而且还奠定了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9·11事件”打破了这个“美国梦”。那些总是沾沾自喜于“美国的安全问题在海外,中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在边境线上”(《长城与空城计》一书作者语)的美国学者,现在可能要变得言辞谨慎多了。因为美国的安全威胁不仅在海外,而且就在本土,在跟前;面对地缘政治的“不对称结构”,美国不再能随心所欲。

第二,虽然成为恐怖组织发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但美国借“9·11事件”之机进军中亚地区,加强了其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存在。“9·11事件”发生后,有两位地缘政治学家的主张值得重视,一位是斯皮克曼,一位是布热津斯基;有两本著作值得再看,一本是《和平地理学》,一本是《大棋局》。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中曾指出,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其战略宗旨应该是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因此,他主张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事务,控制其“边缘地带”。虽然按照斯皮克曼的概念,所谓“边缘地带”主要是指欧亚大陆外围的沿海地区,但在提出这一主张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中亚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当时的中亚属于苏联的版图,美国不便直接插手,斯氏才主张由“边缘地带”从外围控制欧亚大陆,并始终保持在“边缘地带”优势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其目的是遏制苏联对“边缘地带”的蚕食和扩张,保持“边缘地带”对中亚的战

略挤压,以保证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

如果说斯皮克曼的主张还仅仅限于欧亚大陆的外围地带,那么,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的主张则大大推进,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存在扩展到离欧亚大陆腹地更近的中亚地区。布氏说得更直截了当:美国应该利用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变化,深入欧亚大陆腹地,进军中亚。虽然布热津斯基还不可能预见到后来发生的更多事情,但他还是以争夺欧亚大陆控制权的地缘政治斗争作为其包括《大棋局》在内的一系列著作论点的出发点。应该说,“9·11事件”恰恰给美国提供了进入欧亚大陆的最好也最直接的机会,借由保持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美国实际上加强了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存在。这使得无论是斯皮克曼还是布热津斯基的主张都有了一个“现实的版本”。

第三,“9·11事件”后地缘政治的变化使欧亚大陆的“黑洞”问题更为突出,美国正借机填补“黑洞”,但它也面临着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地位就十分突出,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后冷战时期,虽然地缘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但欧亚大陆的重要性并未降低,相反其天平作用更加显著。特别是围绕着所谓“黑洞”现象的出现,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传统的亦即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式的“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布热津斯基认为,中亚国家的独立使“心脏地带”发生内部塌陷,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如同“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一样。他说,“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已成了当代历史上的黑洞,……从近期看,这一情况消除了苏联曾经对其富裕的邻国所形成的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看,这一情况可能是大的和新的政治危险的根源”。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黑洞”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中亚地区的地位发生了极大改变。它既给外来势力、包括美国从“边缘地带”进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大开方便之门,又给美国带来严峻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就前者而言,美国第一次能够将其势力扩展到中亚国家直到中国的西北边

疆,主宰位于欧亚大陆南侧的波斯湾地区,甚至破天荒地掌握了打开“心脏地带”大门的钥匙。因此,美国无疑会洞见“黑洞”问题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并以自身之力填补欧亚大陆的“黑洞”或力量真空。就后者而言,欧亚大陆的“黑洞”问题具有爆炸性。就连布热津斯基也未曾逆料,威胁美国战略的地缘政治因素如此之多,而并不仅仅限于他所主要关注的欧亚大陆上的大国竞争所引发的问题。例如,在极具地缘政治价值的中亚地区,阿富汗境内的“塔利班”势力迅速崛起,控制了该国政权和绝大部分地区,其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不仅扩展到相邻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而且还延伸至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地区。由于“塔利班”和本·拉丹领导的基地组织在反对美国的目标上形成了统一战线,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要通过对中亚地区实施“圣战”将其纳入伊斯兰世界的轨道,对于美国来说中亚地区这个欧亚大陆“软腹部”的地缘政治问题变得突出起来,出现了新的还不太熟悉的地缘政治形势。美国既获得了进入欧亚大陆内部的绝好机会,又面临着不少不确定性的、甚至偶然的意外因素。这些因素一旦显现出其在地缘政治上的能量和爆发力,对美国来说甚至是致命的。而“9·11事

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总之,“9·11事件”引发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问题,其最直接的后果是美国借机向欧亚大陆渗透。但更重要的是,“9·11事件”连同欧亚大陆的“黑洞”问题还使得美国可以直接地而不是迂回地介入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不是从欧亚大陆外围施加影响而是直接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这将导致“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中的重大事态,也将是今后地缘政治的主要特征。正是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围绕欧亚大陆制定了主宰两大洋,以分别有效介入欧洲和亚洲主要事务并取得整个地缘政治主控权的战略。如果这一战略获得成功,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将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甚至可能突破以往地缘政治范围的限制,获得大大超过早期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的欧洲范围。美国的地缘政治扩张超出欧洲地区界限而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特别是对“心脏地带”的进攻性做法,是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主线上展开的新的有战略意义的布局,必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巨大和持续的影响。今天,我们从布什的中亚政策中看到的正是这种影响。○

## 推进反恐要超越冷战思维

杨明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

“9·11事件”五周年,理论界热炒的一个话题就是“9·11事件”本身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或者说五年之后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9·11”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Tum Point)。但也有些人认为“9·11事件”并没有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例如,美国《外交政策》关于“9·11事件”五周年纪念的系列文章就多属后一论点。在这些文章中,“9·11”五年之后,全球化浪潮并没有因主要国家抬高本土安全的门槛而减退;大国间的潜在战略竞

争并没有因反恐合作而消弭;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势力也没有在反恐高压下销声匿迹,等等。而认同“转折点”说法的不少学者则认为,“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源,主要大国的战略关注点也因此出现大幅调整,大国间的合作意识已然逐步超越竞争意识。甚至有人提出“应对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的挑战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内容”。

其实,对“9·11事件”影响的评估既要着眼于国际战略格局的现实,也应从历史和社会两个层面,